

资治通鉴

朱熹
编撰

精
华

对
照

文
白

司马光
原著

吉林出版社

文白对照

资治通鉴精华

(一)

长征出版社

责任编辑:钟希平

装帧设计:周 健

资治通鉴精华[文白对照]

孙通海 李巨泰 等编

长征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阜外大街 34 号, 邮政编码: 100832)

经销: 全国新华书店发行 印刷: 北京平谷县玉福印刷厂

850×1168 毫米 32 开 200 印张 4965 千字

1999 年 8 月北京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 印数: 1—2000 册 定价: 780.00 元

ISBN 7-80015-416-5/I·73

文白对照资治通鉴精华

编委会

策	划:姜新生		
主	编:孙通海	李巨泰	
副	主 编:王秀梅	王景桐	朱振华
主要编撰人(依姓氏笔画为序):			陈 雄
	于 民	子 薇	王 军
	王秀梅	王景桐	毛双民
	石旭红	宁德伟	朱振华
	江 宏	毕素娟	孙通海
	李占领	李逸安	何 愚
	杨梦东	张文强	陈杏珍
	赵 东	赵则训	赵伯陶
	骈宇騫	高流水	梁心琴
责任编辑:钟希平		李 伟	
责任校对:刘荣辉		方生理	武晓东
			王丕来
			仇正伟
			刘尚荣
			李 岩
			余 喆
			陈德礼
			姜 黎
			谢俊峰
			林景星

前 言

史书是社会生活的一面镜子,举凡治乱、兴衰、荣辱、成败,大至兴邦治国,小至待人处事,无不包罗。如今,当祖国从风雨坎坷中走来,踏上富民强国之途,迎接新世纪到来之际,越来越多的人对历史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这是一件可喜的事情。它标志着大众理性的觉醒和社会文明程度的提高。

中华民族有着五千年的文明史,其间,古代先民、先贤创造并留下了光辉灿烂的文化遗产。就史籍而论,其品类繁多,诸如有古史类、纪传类、编年类、纪事本末类、实录类、地理方志类、笔记类、学术史类等等。其篇幅鸿大,如一部《宋史》就有四百九十六卷,近八百万字,对于初涉史学的读者来说,可谓大海捞针,不知从何处下手。又加之现代人以白话为书面语言,近几十年又通行简化字,倘若直接阅读史籍原文,理解辞义,确实存在不少的困难。鉴于此,我们选择了朱熹编著的《资治通鉴纲目》,加以翻译整理,称之为《文白对照资治通鉴纲目》。

一

北宋神宗年间,司马光奉旨领衔编修《资治通鉴》,历时十九年才得以完成。该书共二百九十四卷,四百余万言,上起东周(公元前403年),下迄五代(公元960年),记

述了一千三百六十二年的史事，是中国第一部编年体通史，颇有学术价值，影响很大。

《资治通鉴》这部巨著“网罗宏富，体大思精，为前古之所未有”（《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但它有个不容忽视的缺憾，就是因其篇幅浩繁而难于卒读。司马光本人刚修纂完成后就已觉察到这个问题，他说：“修《通鉴》成，惟王胜之借一读，他人读未尽一纸，已欠伸思睡。”（转引胡三省《新注资治通鉴序》）司马光唯恐一般读者阅读《通鉴》过于疲劳辛苦，打算提纲挈要，删繁就简，更编一部《通鉴举要历》，可惜未竟其事。司马光去世后，到了南宋绍兴初年，胡安国根据司马光的遗稿，编就了《通鉴举要补遗》，以求完成司马光“病本书太详”，“以适厥中”的愿望。朱熹曾经在胡安国家看到《通鉴举要补遗》一书，尽管认为“其文愈约而事愈备”，然而，“犹窃自病记识之弗强，不能有以领其要而及其详”，所以产生了“别为义例”，更创一书的念头。朱熹对司马光及胡安国有关《通鉴》著述的“增损櫟括”，改写为《资治通鉴纲目》。这就是本书的由来及其与《资治通鉴》的关系。

二

朱熹（1130——1200），字元晦，祖籍徽州婺源（今属江西）人。十九岁中进士，自“登第五十年，仕于外者仅九考，立朝才四十日”（《宋史·朱熹传》），即除担任九年地方官和四十天的焕章阁待制兼侍讲外，大半生都从事于学术研究和教育事业。朱熹从事学术研究的范围非常广

博,在文学方面,他对《诗经》、《楚辞》都有精辟的解析和考辨,所著《诗集传》、《楚辞集注》都颇嘉惠后学,有着很高的学术水平和研究价值。在哲学方面,朱熹更是对从先秦至宋代的儒学经典及其儒家思想,进行了系统而深入地整理、考证、阐述、发明,特别是直接继承和发挥了二程的理气说,成为集理学大成的代表人物。朱熹的著名论断:“天地之间,有理有气。理也者,形而上之道也,生物之本也;气也者,形而下之器也,生物之具也。”(《答黄道夫》)突出地体现了他对自然、宇宙规律的探索,尽管历代政界、学界对此假说多持批判态度,但随之科学的进步,人们会认识到朱熹理学的精微可取之处。朱熹对儒学经典著作下力最大,他集中了平生精力编写了《四书集注》,由于朱熹对四书(《大学》、《论语》、《中庸》、《孟子》)的注解和提倡,使四书成为元、明、清时代科举考试的标准教科书,至今《四书集注》仍不失为阅读四书最有价值的版本之一。在史学方面,朱熹虽然不如在哲学上下力之大,但也颇有建树,例如这部《资治通鉴纲目》,就是朱熹亲自主定条例,组织门人共同完成的。朱熹的史识也多有高明之处,例如他在《朱子语类》卷百三十六中,评论唐代史事时说:“唐源流出于夷狄,故闺门失礼之事,不以为异。”陈寅恪曾经对此议论予以首肯,说:“朱子之语,颇为简要,其意未能详知。然即此简略之语句亦含有种族及文化二问题。而此二问题实李唐一代史事关键之所在,治唐史者不可忽视。”(《唐代政治史序论稿》)朱熹在从政与著述的同时,还经常“训诱诸生”,从事讲学活动。他二十四岁任

泉州同安县主簿时,就有后生跟随他学习,至五十岁出知南康军,复建白鹿洞书院,从学弟子日益增多。而后,朱熹又陆续兴建武夷精舍、修复岳麓书院、修建沧州精舍,学者闻风而至,最多曾经达到数百人。宋人黎靖德编辑的《朱子语类》就详细地记载了朱熹与弟子们问答释疑的言论,从中可见朱熹知识的深湛渊博和海人不倦、循循善诱的导师风采。

三

前面已述,朱熹所以有志于改写《资治通鉴》,其原因在于该书篇幅浩繁,难于披阅,但在改写的过程中,朱熹并不是简单的删略压缩,而是别有创意,另设义例的再创作。因此,在《资治通鉴》原素材基础上改写而成的《资治通鉴纲目》,完全可以视为一部新的史书,它除了继承了原书“网罗宏富,体大思精”、“博而得其要,简而周于事”的特色外,还具备了自己新的特色。下面分别加以简述。

一、纲以提要,目以备详,创立纲目体。

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以岁月为经,史事为纬,编年纪事,开创了编年体通史先例,而朱熹承袭了这一编年通史的体例。为了更有效发挥原书提纲挈领的特长,使改写后的著作篇幅显著减少而内含仍然完备弘富,朱熹首次发明和采用了纲、目并列,“纲以提要,目以备详”(《御制资治通鉴纲目全书序》)的体例。所谓纲,就是简明扼要地叙述某年某月发生的重大事件,这部分用大字书写刻印

(按,文白对照本采用黑体排印);所谓目,就是对纲中所标列的重大事件进一步加以周详的阐述和交待。诸如追溯事件的起因,总结事件的结果,详细陈述事件的过程,完整记载人物的言论,等等。这部分用小字书写刻印。朱熹所指的纲,犹如现在讲的大纲、要目、题目;而目,犹如现在讲的细节、详情、内容。但是,朱熹的纲与目,并非一律对应使用,即:有某一条纲,不一定有一条相应的目,但如有一条目,必定要有相应的一条纲。这种纲下或附目或不必附目的运用,正是朱熹笔削剪裁的妙用,即重大史事可以通过纲完备而扼要地交待清楚,而具体细节则根据总体结构及篇幅的需要采取或删或留的处理。在行文中如何把握纲与目的分寸,朱熹曾有明确地说明,他说:“此书无他法,但其纲欲谨严而无脱落,目欲详备而不烦冗耳。”(《朱子与讷斋赵氏论纲目手书》)

由于朱熹成功地运用了纲目体编写史书,终于达到了预期的目的:“使夫岁年之久远,国统之离合,事辞之详略,议论之同异,通贯晓析,如指诸掌。”(《资治通鉴纲目序》)也正是由于纲目体具有开卷了然,一一胪如指掌,脉络显明的优点,自朱熹后,迨至明清,多有人采用这种手法编写史书,他们往往取其“通鉴”与“纲目”中各一字,合成为“纲鉴”二字来命名著作,如明代王世贞编有《纲鉴会纂》,清代吴乘权编有《纲鉴易知录》等。

二、悉用《春秋》笔法,寓褒贬于行文之中。

我们知道,史书是记载业已过去的客观存在的史事史料,这些史事史料一经转述,一经形成文字,必然要渗

入口述者与作者的思想感情和史识观点,要求绝对客观的叙述和描写史事史料,这是不可能的。对于口述者与作者来说,他们的差别仅在于,有的人比较自觉地流露出自己的感情和观点,有的人则不够自觉;有的人态度明朗,表现直率,有的人则往往比较隐晦。而朱熹编写《资治通鉴纲目》,就属于自觉而鲜明地贯彻和体现自己的史识观点和政治思想倾向性的。例如朱熹手定的《纲目凡例》,对编写中将要遇到的诸如统系、岁年、名号、即位、改元、尊立、崩葬、篡贼、废徙、祭祀、行幸、恩泽、朝会、封拜、征伐、废黜、罢免、人事、灾祥等十九项事类,都详细规定了行文要求。其中既有属于技术性的体例规定,也有大量的带有褒贬扬抑性质的称谓规定,正如汪克宽指出的:“褒善贬恶,明著义例,悉用《春秋》书法,一字不苟。”(《资治通鉴纲目考异凡例》)

三、推崇并张扬圣贤政治。

朱熹着手编写《资治通鉴纲目》时,曾经给同道写过这样一段话:“自古治日少,乱日多,史书不好看,损人神气,但又要知不奈何耳。”(《朱子与讷斋赵氏论纲目手书》)“史书不好看”,这是由于世道不理想,综观古往今来的历史,国家与百姓确实没有几天好日子,令人神伤。做为史家的朱熹,他只能尊重历史现实,如实反映历史真实面目,尽管“治日少,乱日多”,也得无奈的接受它,叙述它。但做为政治家、思想家和教育家的朱熹,他不可能放弃理想与追求,不情愿做史料的奴隶,于是他在褒善贬恶的总体把握中,着意推崇和宣扬远古及夏、商、周三代的

圣贤帝王，以尧、舜、禹、汤、文王、武王之道来衡量是非善恶，把他们做为万代帝王的师表。朱熹崇尚尧、舜等远古帝王的政治意识贯穿在《资治通鉴纲目》之中，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凡是《通鉴》原书中有关阐述圣贤之道的言论，不管是出自哪一层人物之口，《纲目》都给予充分地叙述；（二）对于以阐述和弘扬尧、舜之道为己任并开创儒家道统的孔子及其后继后裔的言行，都补《通鉴》原书之不足，摘取其他史书予以补述；（三）对于历代帝王将相推行圣贤之道、儒家教化的言行，均不惜篇幅，加以记载。例如卷五，在汉昭帝元凤元年，记载了汉昭帝征调各郡国所推举的品行端正又讲道义的人进京并予以表彰奖励的事。事情虽小，但事关统治者采取什么手段治理国家、推行什么教化治理社会的大问题。这部分内容，《通鉴》原书不载，是朱熹根据《汉书》载录的。

有些学者对此颇不以为然，斥之为“复古”、“倒退”。我们认为“古”的并非全不好，“今”的并非全进步，关键在于审视“古”与“今”的实质内容。综观自古以来的史书，确有朱熹“治日少，乱日多”的感叹，历史本来就是在刀光剑影、你死我活、兴衰交替、改朝换代中度过的，如果我们要推崇，有哪一位帝王至善至美或接近至善至美呢？再说历代诸项政治措施，都是因时而置、因人而异，如果我们要提倡，有哪一项大法可以百代延续呢？于是，朱熹便在语焉不详的远古，寻找出带有理想色彩的人物。其实，这并非朱熹的独钟，早在先秦诸子，晚至清末，为无数的希冀有个好皇帝、好社会、国泰民安的贤人志士所乐道。当

马列主义学说还未诞生以前，他们只有这个武器，他们也只能利用这个武器。当然，我们并不否认推行圣贤教化的局限性，但是在“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的败坏意识困惑中，在翻开史书页页嗅到血腥气的齷齪黑暗中，向人们迎面走来的，散发着人类真善美光辉的圣贤政治，无疑会给社会带来一缕希望。

四

《资治通鉴纲目》问世后，引起了两类人的较大关注：一是封建帝王，他们看到在“观圣人之迹”、“存王道之正”诸方面，《纲目》比《通鉴》更加鲜明，因之备加推崇，视为“帝王教科书”；二是士人学子，他们获得了《纲目》，也就解决了在有限时间内卒读通史的问题。我们认为，《纲目》的确是一部雅俗共赏的史书：它的篇幅适中，大多数人都可以翻阅浏览；它的史料丰赡严谨，治史的读者可以当作历史课本；它的内容博大深刻，从政的读者可以广识借鉴；它的故事生动警辟，广大的读者可以在茶余饭后品味欣赏。总之，它的可读性大大超过了同类型的史书。

五

犹如《资治通鉴》问世后，历代对该书的研究形成一项专门的学问一样，《资治通鉴纲目》的推出，亦形成了一股研究热潮，诸多研究探讨、考证发微的专门著作相继刊印。例如：宋人尹起莘著有《资治通鉴纲目发明》五十九卷、宋人刘友益著有《资治通鉴纲目书法》五十卷、元人汪

克宽著有《资治通鉴纲目考异》、元人王幼学著有《资治通鉴纲目集览》、元人徐昭文著有《资治通鉴纲目考证》、明人冯智舒著有《资治通鉴纲目质实》等，不一一罗列。清康熙年间，吏部侍郎宋荦编定《通鉴纲目前编》一卷、《外纪》一卷、《举要》三卷及《通鉴纲目续编》二十七卷，当时与康熙御批朱熹原书《资治通鉴纲目》五十九卷合刊，于是遂有正编与前编、续编之分。

《资治通鉴纲目》付梓后，代有刊印，其中流布较广的本子有明代成化本、崇祯本、清代康熙本。我们这次编译《文白对照资治通鉴纲目》，其主要意图是向广大读者介绍中华民族的史学名著，普及历史知识和优秀传统文化，因此我们采取了以译文为主，附录原文以便对照的形式。

在整理过程中，为了工作的便利，我们使用了日本平冢文库文政二年(1819)刊本为工作本，参校了崇祯本、康熙本，并参考中华书局排印本《资治通鉴》一一进行了比勘。原书中的脱误衍倒，根据各本择善而从，个别文义欠妥的地方，根据《资治通鉴》等史书予以纠正。由于本书着重于普及的目的，对于一般性的文字校勘采取了径改不出校记的原则。

清末民初以来，大众阅读已从线装书转向铅字排印本，由于《资治通鉴纲目》从未进行过整理排印，所以一直尘封在书库的架子上，“藏在深闺人不识”，未能显露它的光采。我等同志是首次对该书进行校点整理，译成白话，并定名为《资治通鉴精华》推荐给各界朋友。我们虽尽绵

薄之力,但由于时间紧迫,功力有限,难免有错误疏忽之处,尚望广大读者予以指正。

朱熹资治通鉴精华序

【译文】

前代贤臣温国司马文正公受诏編集《资治通鉴》，书成，又摘录书中的精要部分，另编《目录》三十卷，一并呈上。司马文正公晚年忧虑原书内容过于详细，而《目录》又过于简略，更著《举要历》八十卷，以便适中，然而未能完成。

绍兴初年，故侍读南阳胡文定公开始根据司马文正公的遗稿，重新撰成《举要补遗》若干卷，比之前书，可谓文字更加省约而事件更加完备了。然而往昔在他家里看到此书，得以恭敬地阅读，还是私自忧虑记忆力不强，不能做到领会其中的要领，进而详察其内容。所以尝试功过，不自量力，就与志同道合者参考两公所撰四种著作，另立主旨体例，增删改写，成就此书。

本书以首年起始，相继标出年代，每年之上，在行外书写相应的干支，如遇“甲”字、“子”字，就用朱砂书写，以示区别。当年虽无可记之事，依《举要》体例，亦存年代。依系年代标明统绪，凡系正统之年，干支岁名下大字书写；非系正统之年，分两行书写说明。大字书写以提示要领，凡是大字书写的，有正常之例，亦有变通之例。属于正常之例的，诸如重大事件的始起终末，兴起废止、灾害祥瑞、沿袭变革，以及事关重要的号召命令、征战讨伐、杀戮生养、拜官罢免。属于变通之例的，即不属于以上范围，而其善举足可以为后人效法，其恶迹足可以为后世警戒的，均特加以陈述。而后分行注释，以完备述说，凡是分别加以阐述的内容，有的追溯其起因，有的总结其结果，有的详细陈述事件的经过，有的完整记载人物的言论；

有的凭借事件的始末而体现，有的借助擢升罢免的异同而体现，有的依靠事类的性质而体现，有的通过家世的变迁而体现，其中尚有温国公所立之言、所取之论，有胡氏所录之说、所撰之评，而两公所遗漏的，与近代儒学大师折衷公允的评语，如今也颇摘录以附于文中。使得久远的历史年代，兴衰离合的国家统绪，详略不一的史实陈述，相同乖异的诸家议论，均能贯通一体，明白晓悉，如手指在掌。是书命名为《资治通鉴纲目》，凡五十九卷，意在存放于巾箱之中，姑且便于私下翻阅，以备自己遗忘罢了。

至于论述两公著述的本旨大意，其中有区区我辈所不敢涉及的。尽管如此，岁时周全于朝廷，那么天道得以显明；统绪匡正于民间，那么人道从而确定；大纲概举，那么鉴戒昭然可睹；众目毕张，那么几微明显可见。这样，凡是探求致知格物的学者，也将慨然有感于此，而两公的志向，或许从中有所感悟默识吧！

因述此书的旨意条例如上，列于篇章之首，以待后来君子。

乾道壬辰年（宋孝宗乾道八年，公元1172年）夏四月甲子日，新安朱熹书。

【原文】

先正温国司马文正公受诏編集《资治通鉴》，既成，又撮其精要之语，别为《目录》三十卷，并上之。晚病本书太详，《目录》太简，更著《举要历》八十卷，以适厥中，而未成也。

绍兴初，故侍读南阳胡文定公始复因公遗稿，修成

《举要补遗》若干卷，则其文愈约而事愈备矣。然往者得于其家而伏读之，犹窃自病记识之弗强，不能有以领其要而及其详也。故尝过不自料，辄与同志因两公四书别为义例，增损櫟括以就此编。

盖表岁以首年，逐年之上，行外书某甲子，遇甲字、子字则朱书以别之。虽无事，依《举要》，亦备岁年。而因年以著统，凡正统之年，岁下大书；非正统者，两行分注。大书以提要，凡大书，有正例，有变例。正例如始终、兴废、灾祥、沿革及号令、征伐、杀生、除拜之大者。变例如不在此例，而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皆特书之也。而分注以备言，凡分注，有追原其始者，有遂言其终者，有详陈其事者，有备载其言者；有因始终而见者，有因拜罢而见者，有因事类而见者，有因家世而见者；有温公所立之言、所取之论，有胡氏所收之说、所著之评，而两公所遗，与夫近世大儒先生折衷之语，今亦颇采以附于其间云。使夫岁年之久远，国统之离合，事辞之详略，议论之同异，通贯晓析，如指诸掌，名曰《资治通鉴纲目》，凡五十九卷。藏之巾笥，姑以私便检阅，自备遗忘而已。

若两公述作之本意，则有非区区所敢及者，虽然，岁周于上而天道明矣，统正于下而人道定矣，大纲概举而监戒昭矣，众目毕张而几微著矣。是则，凡为致知格物之学者，亦将慨然有感于斯，而两公之志或庶乎其可以默识矣。

因述其指意条例如此，列于篇端以俟后之君子云。

乾道壬辰夏四月甲子，新安朱熹谨书。